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7.001

宋伟:“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 实力转变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关系”,《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7期,第1-8页。

SONG Wei, “Why China Is Not A Contender?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acific Journal*, Vol. 25, No.7, 2017, pp.1-8.

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 实力转变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宋伟¹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 实力转变理论认为,当新兴大国的力量接近霸权国时,它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不满以及对挑战现存国际制度体系成本收益的考量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本文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了界定争霸国的两个基本标准:实力接近程度和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不满意的程度。争霸国需要在综合国力上达到霸权国国力的80%,并且是不满意现状的国家。论文进而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同时又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受益者。论文最后指出中国应该努力维持与霸权国美国的合作关系,将制度目标限定在获取更多的决策权而不是改变制度规则上。

关键词: 实力转变;争霸国;满意;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7-0001-08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用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中摩擦的增多。一种观点是,中美关系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

惧。^②的确,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肯定会引起霸权国的紧张,两者都有可能想先发制人。阎学通教授曾经说过,“崛起的过程是地位不断上升,和最强国家不断接近的过程,这就涉及到是不是挑战它的问题,别人会有这种怀疑。挑战是个客观的问题,当你和世界

收稿日期:2016-12-06;修订日期:2017-03-17。

作者简介:宋伟(1979—),男,湖南双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区域合作、联盟问题、美国和中国外交政策。

① 雅典和斯巴达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中的两个强国。斯巴达是一个军事色彩非常浓厚的、内向的大陆国家,而雅典则以民主体制、商业和海外扩张为荣。随着雅典的不断对外扩张,它成为了一个帝国。雅典的扩张首先危及到了一些小国,例如科林斯。小国的纷争最后导致了两大巨人的对立。科林斯在鼓动斯巴达开战时着重突出了雅典实力的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在反对雅典的问题上,你们宁愿奉行防御政策而不奉行进攻方针。你们极力拖延这场斗争,结果使雅典抓住时机,幸运地发展成远比原来强大的力量。”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之所以爆发,根源在于雅典实力的增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由此看来,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② [希]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

上最强的国家差距缩小的时候,客观上就是挑战。”“我们平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我们怎么不去打别人。但关键是别人打你不允许你崛起怎么办?这个问题需要得到重视。”^①

不过,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还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只有当新兴大国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导致它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界所熟知的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②由于将“power”翻译为权力,所以许多学者将这一理论翻译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从霸权国向新兴大国的转移导致前者不甘心,从而发动战争阻止这种转移。而应用到中美关系上,中国实力和权力的增长,导致了中美两国必然会走向战略对抗。本文从实力转变理论对于大国关系的基本解读出发,分析中国是否符合争霸国的条件,在实力转变理论的视角下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所应该采取的对外战略。

一、实力转变理论的基本观点

实力转变理论并不是关于国际社会领导权如何转移的理论:如果权力已经在(和平)转移中,那么新兴大国没有必要去发动战争;如果说是因争夺权力而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就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是战争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显然与“power transition”理论构建者的想法是相反的。实力转变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奥甘斯基(A. F. K. Organski)很明确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从“实力转变(power transition)”的角度来解释战争的起因,而“transition”是指新兴大国不断缩小与霸权国实力差距的赶过程程(overtaking process)。^③此外,实力转变理论谈到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的确围绕国际秩序而发生,但不只是围绕着国际秩序领导权的竞争,也是围绕着国际秩序规则制定的竞争。因此,仅仅从领导权的争夺来解释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实力转变理论本身。

实力转变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实力”

(power)和“满意”(satisfaction),因果逻辑是国家实力的转变带来和加重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进而导致了挑战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冲突。奥甘斯基指出,国家实力要素按照重要性排序包括人口规模、政治结构效率、经济发展、国民士气、资源和地理六个方面。但是他意识到,这六个要素之间有可能存在相互重叠的关系,最后他只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一国实力。^④按照奥甘斯基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说法,主要大国可以分为霸权国、争霸国(contender)和非争霸国(noncontender)。争霸国的实力至少要达到国际体系中最强国的80%。当没有国家满足这一标准时,排在前三的国家被界定为争霸国。^⑤因此,实力转变理论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实力差距的缩小的确可能导致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关系的紧张,但是实力转变理论的门槛比较高。在没有迈过足够的实力门槛之前,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兴大国只是潜在争霸国而非现实争霸国。

不过,即便达到了霸权国国力80%的门槛,新兴大国也不一定会成为现实争霸国。这是因为,“满意”是实力转变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否满意是针对主导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而言。实力转变理论认为,主导国依靠自己的实力以及盟友的支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本国的收益分配规则。新兴大国如果不满意现行国际秩序的收益分配方式,那么它就会“不满意”。满意的国家是维持现状国家;不满意的国家是

① 阎学通:“对‘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6页。

② 对于这一理论的详细述评,参见宋伟:“权力转移还是实力转变?——实力转变理论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

③ Jacek Kugler and A.F.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9, p. 178.

④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p. 203-210.

⑤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206.

修正主义国家。^①很自然地,一些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收益分配方式和主导国的领导地位会感到不满,认为本国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和地位。^②但只有当实力足够同时又不满意时,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当不满的国家实力弱小时,它们不能(单个或联合起来)对主导国和支持现行国际秩序的联盟构成威胁。只有当不满的国家也是一个大国,并且成功地赶上主导国时,导致重大冲突的挑战才具备了基础——但这是很少见的。”^③因此,只有当实力足够同时又希望改变现存国际秩序时,新兴大国才能被视为现实的“争霸国”。如果实力不够而去争霸,那只是不够资格的挑战者而已;如果实力足够但是满足于现存的国际秩序,那么就停留在潜在争霸国的身份,而不会成为现实争霸国。^④

实力转变理论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虽然新兴大国很自然地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否一定意味着对现存国际秩序总体上的不满意?如果只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某一些机制、规则不满,但总体上感到满意的话,新兴大国仍然不会成为现实争霸国。实力转变理论倾向于强调实力的意义,认为只要实力差距缩小到足够的程度,那么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的不满就会加强——即便是满意现有的秩序规则,新兴大国也会要求领导权,从而导致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这一逻辑仍然是存疑的:如果新兴大国满意现有的规则,那么在它的实力决定性超过现有霸权国(至少达到霸权国实力的120%)之前,它何必冒着很大的风险去获得这种所谓的“领导权”呢?美国的和平崛起是代价最小的和平崛起,原因在于,它满意英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规则,并且不急于获得所谓的领导权。二战结束后,英国自觉无力承担原有的国际责任,主动向美国交出领导权。^⑤

二、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 实力关系的考察

实力转变理论认为,霸权国和争霸国之间

一定会走向冲突。如果中国是争霸国,那么和现有的霸权国美国一定会走向冲突。这是合乎逻辑的理论运用。但是,还需要考察霸权国对于实力差距的缩小有多敏感,以及新兴大国是否达到了争霸国的基本门槛。的确,从现实的中美关系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居安思危”传统的国家,对于实力差距的缩小相当敏感。事实上,即使在美日结盟共同对付苏联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已经使得许多美国政治精英惴惴不安,“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可以形象地认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跑中至少要和对手保持1000米的距离。一旦距离缩短到500米,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不过,美国政治精英对实力差距的缩小虽然很敏感,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多次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崛起。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总体上保持了克制,直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逐步形成“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止。即便是出

①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23;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9, p. 173.

②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9, p. 173.

③ 同②, p. 174.

④ 本文所使用的霸权国、争霸国等术语,与所谓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霸权国是国际体系中远远强于其他大国的最强国。它有可能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也有可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和平与繁荣。类似地,争霸国是有能力、有意愿获得霸权地位的国家,至于它创造一套什么样的霸权制度体系,是自私专制的,还是开放自由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霸权国的定义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⑤ 1947年2月21日,英国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结束援助希、土的照会,声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英国在3月31日以后无法继续向希腊、土耳其两国提供援助。英国强调希、土面临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根本无力维护“民主制度”,由于希、土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决不能眼看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事件是英国政府向美国和平转移霸权地位的一个基本标志。

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也遇到了“实施不力”的批评。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2015年2月在外交关系理事会演讲时说,在总统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很难看出政府正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①同时,美国的许多政治精英指出,不应该夸大中国实力增长的威胁。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就系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像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或巴西这样的挑战者在21世纪中叶超过美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②

从中国和日本的角度来看,两国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资格去充当争霸国。按照实力转变理论的实力标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都没有能达到争霸国的门槛。奥甘斯基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依据来衡量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而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般来说对新兴大国更为有利,因为霸权国所具有的海外资产往往超过新兴大国。例如,美国现在拥有的海外资产大概在20万亿美元,而且大多数是高收益的企业资产,包括在中国也有6000亿美元左右。美国投资者是阿里巴巴和百度的主要股东之一。^③如果考虑对中国有利的GDP指标,2015年,美国的GDP是18.04万亿美元,而中国是11万亿美元,中国只是刚刚超过美国的60%,还没有达到80%的门槛。^④

如果综合考察人均GDP、军事力量、地缘政治环境、同盟支持等因素,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以军事力量对比为例,美国已经有10个作战经验丰富的航母战斗群,而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还在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中;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到世界的39%,而中国大概是11%;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已经服役,而刚刚进入中国空军服役的歼-20目前还没有装配国产发动机。^⑤人均GDP的差距可能更大。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8000美元,而美国已经是55000美元左右。人均GDP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水平、技术发达程度、富

裕程度,还意味着社会可能具有较高的凝聚力、在较长时期里为国家政策提供资源的能力,即所谓的“民富国强”。相比之下,中国仍然处在“国强民弱”的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继续前进达到美国国力80%的难度不小。史蒂夫·陈(Steve Chan)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假如使用不同的国家实力衡量方法,就会得出中美之间是否出现实力转变的不同结果。如果考察人口、陆军和重工业,那么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已经明显缩小;如果考察人力资本、高新技术,那么看不到实力转变的明显迹象。而在衡量实力转变时,史蒂夫·陈显然更多关注先进产业的领先程度。^⑥

当然,考虑到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美国综合国力80%这一门槛,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霸权国之后的前3名都可以是争霸国。但很显然,按照这一标准所得出的争霸国本质上只是潜在争霸国,因为它们并没有足够实力去做争霸国,只是在霸权国眼中有可能成为争霸国而已。这一标准无疑是一个很勉强的“争霸国”门槛。不过,即便依据这一标准,也不能得出中国就是争霸国的结论。毕竟,德国、日本、俄罗斯大体上与中国现在处于同一实力层次,它们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也有很多的不满。德国和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得更大的制度性权力;俄罗斯则希望对抗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战略挤压、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① “美媒:分身乏术 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空洞不实”,参考消息网,2017年3月17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226/679499.shtml。

② [美]约瑟夫·奈著,邵杜阁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③ 于晓华:“为什么美国投资赢了中国”,凤凰网财经网,2017年3月17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9/13368031_0.shtml。

④ “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站,2017年3月17日,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name_desc=false。

⑤ “中国歼20战机将换装国产发动机 性能获极大提升”,环球网,http://wap.huanqiu.com/r/MV8wXzEwMzA0NTMyXzI1XzE0ODk0NDExNDA=。

⑥ Steve Chan, “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 *Asian Survey*, Vol.45, No.5, Sept./Oct. 2005, p.701.

相比之下,中国是过去十几年中经济快速发展、受益于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大国。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的标准,即中国与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 制度关系的考察

实力转变理论和霸权稳定理论都认为,随着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大国改变旧秩序的成本降低了,收益上升了。旧的霸主要么和平让位,要么和新兴大国展开一场霸权战争。总之,国际秩序是霸权国家制定的,更有利于霸权国家的利益,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就会出现。^①那么,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加深中国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不满,导致中国和美国围绕国际秩序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表面看好像如此。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就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谈新秩序,那自然和旧秩序相对、相冲突。不过,在应用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时,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很多机制和规则。例如,如果没有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的基本规则,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哪一个世界市场开放?如果没有出口对于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贫富差距大、内需十分有限的中国,如何能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实现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

考察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关系,我们可以按照制度对后来者是否有利的标准,将现有的国际制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放但不均衡的国际经济机制。所谓开放,是指后来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现有制度中的强者。所谓不平衡,是指各国在制度中的话语权、决定权不同。虽然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

率,在自由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参与全球经济、发挥比较优势,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机遇。事实上,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秩序中,新兴大国未必是修正主义国家,而主导国家也未必是维持现状国家。^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谈到这种现象时断言说,霸权国家并不总是对二流国家进行剥削。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英镑本位制的全盛时期,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业增长率为50%到400%不等,但都高于英国。第二个例子是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尽管美国统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金融体系,但欧洲、日本的发展速度却超过美国。^④也就是说,随着各国相对生产率的变化,世界市场上的相对收益格局反而不利于霸权国。

经济自由化的确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行业处于不利境地,也有可能造就一个四处剥削的跨国资本阶级,但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本身并不带有太多的私利性。以农产品为例,中国的农产品正在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搞农产品保护会导致非常大的效率损失,而且以后取消保护时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总之,现在不实行农产品保护的代价小于现在搞保护以后再取消保护的代价。中国不能搞农产品价格保护,而应该支持农业发展。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才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事实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世界的市场向中国开放,构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作为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在劳动生产方面的低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强势的地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③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5-56.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著,林茂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3页。

位,对发达国家的许多行业构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些基本的事实说明,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是这一制度体系的受益者。

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有一些方面的确是不均衡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按照国家的经济规模来分配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内部的份额和投票权。世界贸易组织采取的虽然是均衡的决策程序,即协商一致,但是,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由于拥有更多的市场、资金和其他资源,实际上拥有多得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中,美国依靠它的资金和市场资源,仍然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中国同样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已经成为第3大份额持有国和投票权持有国。中国不仅是开放经济规则的受益者,也是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中的主要玩家。以前对中国来说可能不利的一些规则——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规则中,都带有许多的附加条件。如果是受援国,很多时候就不得不接受一些比较严苛的贷款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从受援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这就意味着,这些规则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反而是有利的。通过附加必要的贷款条件,中国不仅能够确保自己贷款的安全,还能够国际事务中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类国际制度是封闭且不均衡的国际安全机制。这些制度有利于守成大国而不是新兴大国,且各国的权力分配不均衡。对于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尽管已经或者正在改变着地区和全球的力量分配结构,但是它们并不能很自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者合法的核大国,拥有和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一样的权利。这与国际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制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即便进入了现有体制的内部,它们也不一定能获得同样的权力。例如,在安理会,它们只能被选为非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它们可以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但是它们只能获得符

合规定的民用核技术而不能发展核武器。尽管印度爆炸了核武器,但是时至今日,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并不认为印度是合法的拥核国家。因此,在安全领域,奉行的是大国优先的治理原则,其封闭性导致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不均衡。

第二类国际制度虽然是封闭性的,但是中国却处于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本质上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兴国家”,而是一个“守成大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核不扩散机制中合法的拥核国家。这一特殊地位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形成的。对于德国、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强国来说,它们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最不满意的方面就集中在这里,而中国和俄罗斯却应该是“满意国家”。

第三类国际制度包括的是一些非关键性的国际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各国所处的地位都差不多,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会。这一类制度一般来说奉行的是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在权力分配中奉行“一国一票”的方式。尽管大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但是并不能决定性地主导这些制度。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这些制度往往成为批评和制约霸权国以及大国的工具。不管是对于霸权国还是新兴大国来说,它们都没有必要在这些制度中投入过多的资源去充当主导者。由于占多数的中小国家常常反对霸权国的单边主义,因此新兴大国在第三类国际制度中的处境往往比霸权国有利。例如,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中往往因为支持以色列而受到孤立和批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坚持信息主权和文明多样性,美国则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在1984年甚至选择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对来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国际组织中反而处于比较有利甚至是强势的地位。

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曾经这样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支持许多本质上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

秩序现状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等)。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实践中反对任何可能削弱五个核大国权力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中国极力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在联合国之外使用武力的方式。从更大意义上说,中国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组织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最有力的维护者。它反对自由国际主义国家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任何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保守的力量。”^①我们所提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主要角度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并不是“秩序”,只是某些大国的对外行为方式而已。而我们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是完全不矛盾的;相反,它们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因此,总的来看,中国是二战后国际制度体系的受益者,是满意国家而非不满意的国家。正如2015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蓝厅论坛讲演中所说的,“现在,中国已加入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400多项国际多边条约,成为当今国际秩序和体系中最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之一。我们没有理由去挑战在战胜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动机去推翻自己全面参与的国际体系。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②即便按照界定争霸国的第二个标准,中国现在是美国之外的前三个强国之一,但本质上中国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并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不管是三类国际制度的哪一类,对中国而言,都不构成严重的损害或者威胁。因此,中国完全不符合实力转变理论中所说的争霸国的第二个标准。

四、结 语

本文从实力转变理论出发,分析了新兴大国成为争霸国的两个基本标准,然后依据这两个标准,分析中国是否满足作为争霸国的基本

条件。论文指出,中国目前来看,还达不到美国综合实力80%的实力标准,只是潜在的争霸国;同时,中国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没有动力和必要去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所做的,只是对其中一些机制和规则提出改革的主张,使其尽量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因此,很显然,依据实力转变理论,中国绝对不是所谓的争霸国。恰恰相反,中国应该是有很强动力和霸权国合作、维护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新兴大国。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潜在的争霸国,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先发展自己,而不是急于做国际秩序中的领导者。如果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规则是基本有利的,中国何必去做责任最大的领导者呢?中国应该做的,是在维护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维护与霸权国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增加本国的制度性权力,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状态。而增加制度性权力,并不会直接挑战现存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是霸权国的领导地位,也就不会把中国摆到一个所谓的“争霸国”的位置上。如果中国的经济力量能够继续发展,并且将来有一天综合国力实质性地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愿意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和平移交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中国所需要做的,也只是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花费巨大的成本去重建一套规则。

编辑 李 亚

^① [加]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2页。

^② “王毅: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e/cebe/chn/zgwj/t1297034.htm>。

Why China Is Not A Contender?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ONG Wei¹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n inevitabl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sing great power and the hegemon when its power approaches that of the hegemon, and thus becomes more aggressive in weighing up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article analyzes two basic standards of contender: power discrepancy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a contender should be more than 80% of the hegemonic power, and the contender wan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e article then discusses why China is not a contender, since China, being a beneficiary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still much weaker than America. China should maintain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gemon, aiming to get more decision power rather than change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Key words: power transition; contender; satisfac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